

春秋繁露

主编 董治安
译注 张忠纲
周桂钿 明星 等



原著

董仲舒

春秋繁露

主编 董治安

张忠纲

译注 周桂钿

朋 星 等



原著

董仲舒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秋繁露/ (汉) 董仲舒著；周桂钿等译注. - 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2000

(中国儒哲十大名著/董治安，张忠纲主编)

ISBN 7-80642-307-9

I . 春… II . ①董… ②周… III . ①春秋繁露 – 注释 ②春秋繁露 – 译文 IV . B234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0476 号

中国儒哲十大名著

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

春秋繁露

原著 董仲舒

译注 周桂钿 朋 星 等

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：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：250001)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3.75 印张 4 插页 55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01—3000

ISBN7-80642-307-9/I·67

全套定价：256.00 元

《中国儒哲十大名著》编委会

主 编: 董治安 张忠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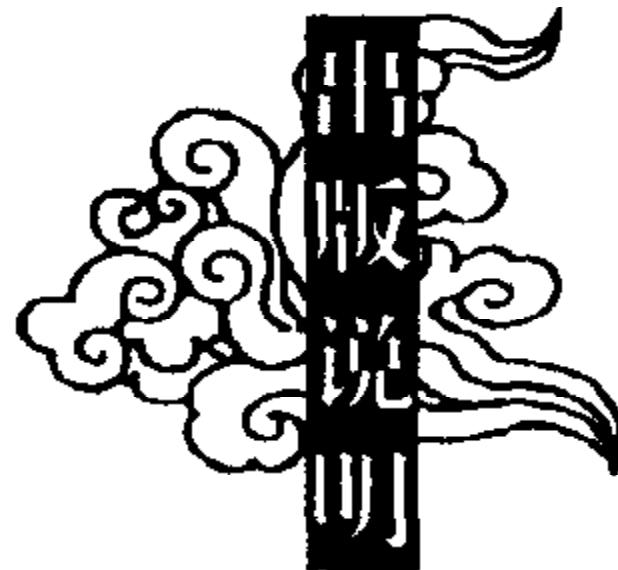
副主编: 董 时 刘凤泉

编 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刘凤泉 牟瑞平 张茂华

张忠纲 朋 星 姚文瑞

鹿风芍 董 时 董治安



儒学，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结晶。

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，经过长期的积淀，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今天，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必须弘扬民族文化传统，继承儒家思想的精华。为此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《中国儒哲十大名著》丛书。

从汗牛充栋的儒学典籍中，我们精选出儒学思想家的十部著名著作，加以译注。这十部著作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法言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朱子性理语类》、《象山语录》、《传习录》、《思问录》。这些著作在儒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占有重要地位，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。无论从理论价值，还是从社会作用来看，它们都无疑是儒学著作的典范代表。

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。在注译过程中，编者态度严谨，付出了很大努力。首先，选择善本，对原文作了认真校勘；其次，尽可能吸收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，力争做到注释详明，译语精当；此外，书前引言和篇前题解，撮其旨意，也颇能便利读者。

在新世纪到来之际，儒学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升温。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，正在汇聚到世界现代文化的洪流中，这对全人类的

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我们相信，《中国儒哲十大名著》的出版，对于儒学进一步走向现代、走向世界，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2000年12月



《春秋繁露》是董仲舒的代表作，《天人三策》有他的思想精华。这两者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资料。

董仲舒是西汉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，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重要思想家之一，上承孔子，下启朱熹，成为儒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，为奠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做出决定性的贡献。

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 198 年（清代苏舆在《春秋繁露义证》中定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 178 年，这是错误的，与《汉书》说董仲舒“亲见四世”的说法不一致。现在许多文章却沿用这种错误说法），约卒于公元前 106 年。早年专心研究春秋公羊学，在汉景帝时代任经学博士，并教授很多弟子。他专心研究时，曾经三年不去看自己的园圃。他的学生很多，都是由几个先来的学生，从董仲舒那里学习后再去教其他的学生。有的学生在董仲舒那里学习了几年，还没有见过董仲舒的面。汉武帝时代，他参加对策，连续三次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，被任命为江都相。这三次对策的策文主要讲了天人感应的问题，后人称为“天人三策”。任江都相期间曾一度任中大夫。后从江都相调任胶西相。不久，由于年老，又不得志，辞职回家，专心从事著述和教学工作。他虽然穷居陋巷，朝廷有些议而不决的事，还派御史大

夫张汤等去向他咨询。董仲舒的著作由后人汇编成一书，汉代时称《董仲舒书》，后来称《春秋繁露》。班固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收入董仲舒的三篇对策，即《天人三策》，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。这些学术成果，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靠资料。另外，董仲舒培养了一大批学生，其中著名的有嬴公（汉昭帝时任谏议大夫）、褚大（任梁相）、吕步舒（任长史）、殷忠（《汉书》作段仲）等。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弟子约有几百人。他的子孙也都因为有学问而当了大官。董仲舒的学生及后学著名的还有眭孟、孟卿、严彭祖、颜安乐、刘向、王彦以及东汉何休等。西汉另外两个著名的公羊学大家：一个是胡母子都，另一个是他的著名弟子公孙弘。公孙弘当了大官，没有从事教学工作，因此没有弟子。董仲舒以后，研究公羊学的学者大都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和后学。西汉时公羊学很盛行，在政治上影响很大，实际上是董仲舒思想对于政治的影响的结果。因此，汉代思想家认为董仲舒“始推阴阳，为儒者宗”（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）。刘向说：“董仲舒有王佐之材，虽伊、吕亡（无）以加，管、晏之属，伯（霸）者之佐，殆不及也。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刘向认为董仲舒是王者的助手，与商汤的助手伊尹、周武王的助手吕望差不多，管仲和晏婴只是霸者的助手，比不上董仲舒。刘向的儿子刘歆虽然不认为董仲舒超过管仲和晏婴，但也承认董仲舒在西汉时代“为群儒首”（同上），是当时儒者的首领。东汉王充是一个特立人物，轻易不盲从别人所说，一切思想都要经过自己重新思考，再作判断。他认为董仲舒是孔子的真正继承者。他说：董仲舒“虽无鼎足之位，知在公卿之上”（《论衡·别通》）。又说：“文王之文在孔子，孔子之文在仲舒。”（《论衡·超奇》）他认为董仲舒是周文王、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，是圣统的继承者。用现代话说，那就是当代圣人。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。董仲舒思想的影

响还可以从当时的一些著作中反映出来。例如，东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，天下经学大家聚会，讨论经学中的不同意见，最后由皇帝“称制临决”，由史学家班固写成会议纪要，名曰《白虎通义》。在《白虎通义》中多次引用董仲舒的说法来论证一种观点，如说“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”（《春秋繁露·基义》）。《白虎通义·三纲》说：“三纲法天地人。”董仲舒在《五行对》中首先提出“五行莫贵于土”，《白虎通义·五行》也采取了这种说法。另外，董仲舒的“王者有改道之文，无改道之实”，“未逾年之君，当称子”，还有灾异谴告说、性情阴阳说，也都被《白虎通义》所采纳。东汉许慎编《说文解字》，也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。如对“王”的解释，就用董仲舒的说法。许慎被称为“五经无双”的精通经学的人物，在编这种权威性的字典时，也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，说明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是有权威性的。

董仲舒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呢？这跟他的思想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有关系。哲学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：一是求真的科学哲学，二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，三是求美的艺术哲学。董仲舒的思想从总体上说，是求善的政治哲学。他的思想体系是政治哲学思想体系。他的这个思想体系，用最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，就是“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”（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）。

“屈民而伸君”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即皇帝。这是董仲舒对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总结。周代末年，诸侯强大，不服从周天子，于是天下分裂；整个社会陷于长期战乱，民不聊生。人民要过安定的生活，就需要社会稳定。为了社会稳定，就要确立天子的权威。“王权是社会秩序的代表”（恩格斯语）。只有“屈民而伸君”，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。在汉景帝时代，由于吴楚七国叛乱，曾经破坏了安定的秩序，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。董仲

舒亲身经历这一场灾难，总结教训，他认为必须让所有的“民”都要服从天子，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，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。这个“民”，主要是指那些地方上有政治实力的诸侯国王，因为只有这些人物才会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董仲舒所的政治“大一统”。大一统，是强调统一，反对分裂，防止分裂的一个重要思想。这是当时有远见卓识的理论，也是针对当时分裂危险而提出的非常正确的理论。

“屈君而伸天”，这是说国君要服从上天。全民统一于皇帝，虽然防止了分裂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倾向——专制。秦朝虽然统一了，却由于皇帝专制，也一样导致天下大乱。董仲舒提出这个问题，是从另一个方向总结了历史的教训。上天是什么？天有什么意志？谁也不知道。但是，董仲舒说，天意是可以从自然现象中研究出来的。董仲舒用一套天人感应理论来解说天意，一方面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论，一方面把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命论结合起来。他认为：人，特别是皇帝的思想行为，会感动上天。上天会根据皇帝的言行，作出表态，并通过自然现象表达出来。如何表达？这是董仲舒的解释：上天用灾害（旱灾、水灾、虫灾等）和怪异（山崩、地动、母鸡报晓等）来批评、警告皇帝。皇帝如果改正错误，这些反常的现象就会自然消失。如果皇帝执迷不悟，那么，上天就会让皇帝身败名裂，重新选能够保护人民的人当皇帝。如果皇帝为人民做了好事，上天也会用祥瑞来表示赞赏。祥瑞包括嘉禾、灵芝、甘露、龙凤、瑞草等。简单地说就是：天下出现灾害，就是上天对皇帝的批评；天下出现祥瑞，就是上天对皇帝的表扬。皇帝是封建时代政权宝塔上的人物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一般官员给他提意见，不受重视，不起太大作用。但是，一说到天，他就不敢不认真听取。皇帝有什么错误，当官的不敢提，或者提了也没有用。有了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，

等于有了向皇帝提意见的精神武器。当官的就可以利用当时的一些天灾或者什么怪异，来解说天意，给皇帝提意见。皇帝把这种意见看成是天意，认真听取，并且加以改正。董仲舒的这句话，就是说皇帝要听上天的。天又是按儒家思想塑造出来的。归根到底，皇帝要听儒家的。也就是说，要用儒家的思想统一全天下的思想。上自天子皇帝，下至百官万民，都要遵循儒家思想，都要以儒家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。在这里，“大一统”在思想上就是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关于这一点，董仲舒在对策中曾向汉武帝提出建议：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，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，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守矣。”这是用“大一统”来讲“独尊儒术”问题的重要论述。独尊儒术以后，司马迁说：“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自天子以至庶人论六艺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从此以后，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干。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，升到独尊地位，董仲舒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孔子也因此成为“历代帝王师”。

董仲舒这种思想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。秦朝皇帝不信上天，为所欲为，以天下奉一己，搅得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秦始皇是无法无天的。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，就要产生严重的腐败。这是普遍规律，也是东西方思想家的共识。因此，董仲舒认为需要给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加上精神枷锁，使他的个人欲望受到一定的限制。这样，社会才能安定，人民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。董仲舒抬出天命论，是社会政治的需要。加以改造，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。

总之，董仲舒的政治哲学，核心思想是大一统。大一统分两个方面：一是政治上的统一，统一于皇帝；二是思想上的统一，统一于儒家思想。儒家思想以天的形式，凌驾于政权之上。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，形式上是神学的唯心主义目的论，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哲学。

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具体内容主要有：

一、德治。董仲舒认为政治统治主要有两手：德与刑。他认为好的政治总是以德治为主，刑治为辅。他以天来讲这个道理。夏天，万物生长，是天重德的表现；冬天，是行刑政的表现，这时万物都已经躲藏起来了。这说明天把刑放在空处。他认为，因此实行好的政治也应该实施德治，刑要设而不用。给人民多一些恩惠，尽量避免使用刑罚。

二、调均。董仲舒认为，贫富两极分化，最容易导致天下大乱。“大富则骄，大贫则忧。忧则为盗，骄则为暴，此众人之情也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度制》）贫穷的人当强盗，富裕的人为非作歹，这样社会怎么能安定？因此董仲舒认为政府应该进行调均工作，使富裕的人能够显示自己比别人高贵，但没有横暴乡里的资格；使贫穷的人，年成好时一年都能吃饱饭，年成不好时也不至于饿死，上可以赡养老人，下可以抚养子女。他们能够这样生活下去，就不会去当强盗。

三、不与民争利。调均的政策是好的，要实行起来还比较困难。难在何处？难在当官的要与民争利。当官的有权有势，又有雄厚的资本，平民百姓自然争不过他们。董仲舒说，动物有四条腿的就没有翅膀，有翅膀的就只有两条腿。有上齿的就不长角（马），长角的就没有上齿（牛）。天生万物时，都不能兼给两方面的条件（兼予），人自然也不能得双份利益。当官的有了俸禄，就不应该再利用其他手段获取利益。他举了公仪休的例子。公仪

休是鲁国相，有一天，他吃到自己家种的葵菜，就把自己园中的菜都拔掉，认为自己拿了俸禄，还种菜，这是与菜农争利。他的夫人自己织布，他认为这是与女工争利，便把妻子休了。这就是所谓“拔葵出妻”。他引了孔子的话“不患贫而患不均”，来证明他的调均思想。调均的关键在于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。当官的能够接受这种调均思想，怎么会有贪污受贿的事呢？怎么会有假公济私、以权谋私、结党营私这类肮脏的事情呢？

四、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，可以把董仲舒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。强调道义，办一切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道义。不能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功利。道义与功利的区别在于，道义是为人民的，功利是为自己的。有些事从表面看，好像是为人民的，而出发点却是为了私利。例如有的人搞所谓纪念碑工程，不管人民是否急切需要，他就下令大兴土木，建筑楼堂馆所，为自己树碑立传。董仲舒认为不要计较个人的功利，对于人民的功利，实际上就是道义，应该正确推行。因此，所谓不要功利，是后人的误解。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来说，重道义，是完全应该的。对于当官的人来说，重道义是责任，是使命，更加忽视不得。

五、董仲舒对于仁政曾经提到一些具体措施：一是塞并兼之路，限定每个人所占的土地，不允许任何人占领过多的土地。二是盐铁经营权归还给人民，反对由政府来垄断经营。三是除去专杀奴婢的特权。四是减轻人民的负担，“薄赋敛，省徭役，以宽民力”。

董仲舒的思想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。北宋的司马光说“吾爱董仲舒”，南宋的朱熹称董仲舒为“纯儒”，并把他的“正谊”“明道”两句话写入学规。清代有一大批学者研究并重新评价公羊学，同时也给予董仲舒以充分的注意。清代著名公羊学者有孔

广森、庄存与、刘逢禄、龚自珍、魏源、凌曙、戴望、陈立、王闿运、廖季平、康有为、苏舆、皮锡瑞、唐晏等。他们对董仲舒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，同时对于他的天人感应说进行批评的同时，也给予理解，认为是当时时代的需要。

董仲舒一生的功业，可用一个对联来概括：

上承孔子，下启朱熹，始推阴阳，为群儒首；

前对汉武，后相江都，初倡一统，罢百家书。

本书以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（苏舆撰，钟哲点校，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）为底本，参以他本，汇校勘定。《春秋繁露》宋本已不多见，南宋楼鑰于宋宁宗嘉定三年（1207年）整理此书，始得八十二篇，后存于明《永乐大典》中。清乾隆年间，馆臣据此对勘，补1121字，删121字，改定1829字，是为“官本”；随后聚珍版（即活字版。清乾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命馆臣择罕见之书校正刊行，由户部侍郎金简主管此事。金简以枣木制活字25万余，用以排印，力省功多。因活字之名不雅，赐名“聚珍版”）《春秋繁露》面世，为诸家所关注。乾、嘉之际出现的《春秋繁露》两大校本——卢文弨校本和凌曙注本，均以聚珍本为主，所不同的是卢本参以明嘉靖蜀中本及明程荣、何允中两家本，凌本则参以明王道焜及张惠言读本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苏州人苏舆（？—1914年，字厚庵）兼取卢本和凌注，又得明天启本，撰成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是目前为止较完善的本子。故本书以之为底本，个别地方酌取他本。

《春秋繁露》错简、文字脱误的现象较多。对于其中一些不能读解的，本书亦付之阙如，不敢妄加穿凿附会。限于水平，错失之处敬请读者指正是荷。

本书由周桂钿、朋星确定体例、通审全稿。具体执笔分工是：周桂钿注译第1~2篇，朋星注译第3~5篇及《天人三策》，周兵注译第6~20篇，胡永中注译第21~30篇，李英华注译第31~47篇，章伟文注译第48~61篇，鲍世斌注译第62~71篇，李祥俊注译第72~82篇。

目 录



引言	/001/
楚庄王第一	/001/
玉杯第二	/027/
竹林第三	/053/
玉英第四	/075/
精华第五	/095/
王道第六	/109/
灭国上第七	/137/
灭国下第八	/143/
随本消息第九	/149/
盟会要第十	/157/
正贯第十一	/161/
十指第十二	/167/
重政第十三	/173/
服制像第十四	/179/

二端第十五	/183/
符瑞第十六	/189/
俞序第十七	/193/
离合根第十八	/199/
立元神第十九	/203/
保位权第二十	/213/
考功名第二十一	/219/
通国身第二十二	/229/
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	/233/
官制象天第二十四	/263/
尧舜不擅移、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	/275/
服制第二十六	/281/
度制第二十七	/285/
爵国第二十八	/293/
仁义法第二十九	/311/
必仁且智第三十	/323/
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	/331/
对江都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	/337/
观德第三十三	/343/
奉本第三十四	/355/
深察名号第三十五	/363/
实性第三十六	/383/
诸侯第三十七	/389/
五行对第三十八	/393/
阙文第三十九	/399/
阙文第四十	/401/